

进出口能否“稳就业”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李磊 盛斌 王小洁

摘要：就业稳定是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保障。本文采用微观企业数据对进出口贸易与企业就业波动的内在关联与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与非贸易企业相比，从事进出口的企业具有较低的就业波动性。进出口量越高以及进出口强度越高的企业，其就业波动性越低。同时，永久贸易商相比临时参与贸易的企业具有较低的就业波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更高数量的出口目的国以及出口种类与更低水平的就业波动性相关，进口国家数量与企业就业波动负相关，但是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对企业就业波动无显著影响。对进口的分解表明，进口强度和就业波动性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中间品决定的。区分不同收入水平伙伴国贸易发现，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贸易，其就业波动性较低。区分企业所有制特征发现，进出口对企业就业波动的负向影响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比较显著，但是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对全球贸易保护升级背景下，用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稳定就业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进口；出口；就业；波动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0) 08-0001-17

引言

积极促进就业、实现稳定就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和必要保证。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中国制造业部门历经历了大量的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就业波动性问题日益凸显。就业波动较大，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不利于企业的成本控制。在2017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牢

[收稿日期] 2019-07-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企业‘走出去’对中国就业影响问题研究”(18BJL12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女性就业和工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与政策研究”(17YJC7902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及对策研究”(63192304)。

[作者信息] 李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王小洁（通讯作者）：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创新与环境战略研究中心讲师 266100 电子邮箱 xiaojie_nk@126.com。

牢抓住就业这一民生之本，把稳就业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积极就业政策与就业优先战略，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在当前经济调结构、社会临转型的大背景下，妥善解决好就业问题尤为重要。

从宏观视角来看，就业波动性的影响因素可归结为如下两大类：一是对内改革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以及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等因素，二是对外开放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其中进出口贸易是经济全球化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自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入了新一轮加速增长阶段。到2010年，入世时承诺的关税减让义务已经基本完成，平均关税税率从入世前的15.3%降至9.8%。2013年到2015年期间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进出口贸易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也对本国就业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进出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提升已成为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影响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对于我国的就业活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探究进出口贸易对于制造业企业“稳就业”的内在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涵。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实践为本文考察贸易活动如何影响一国就业波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观察窗口。中国的贸易表现到底如何影响本土的就业状况？现有的贸易模式能否起到“稳就业”的目的？稳就业的本质就是稳经济，核心就是要稳企业。企业不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贡献者，也是创造社会就业岗位的主力军和生力军。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对更为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国企业进出口贸易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进而影响到就业稳定。鉴于此，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企业层面的进出口数据和就业数据，在微观层面深入探究了进出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就业波动性的影响。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丰富和拓展：其一，与以往基于宏观总量与中观产业层面的就业波动研究不同，本文率先采用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对进出口贸易与企业就业波动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行研究，本文的出发点虽然是国家稳定就业，但是主要是从企业的角度进行的，国家总体就业的保障离不开企业就业的稳定，关注企业的就业稳定能够从更本质的视角对“稳就业”进行研究。其二，本文不仅关注企业参与进出口对企业就业波动的影响，还进一步考虑了进出口的规模、强度、持续时间、伙伴国、商品种类、进口方式等对就业波动的影响，由此获得更为细化的研究结论。其三，本文利用2000—2013这一区间的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以5年期为跨度计算了连续性的滚动窗口，并以8年期为跨度测算了稳健性检验指标，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观测值，还可以在估计方程中引入时间序列的变化，并通过固定效应对企业内部的贸易状况和波动性的变化进行更为精准的测算。其四，相比于以往研究对于进出口与就业波动关系的模糊性结论，本文研究发现，进出口贸易对于我国就业具有强有力的稳定作用，这也显示了我国在全

球贸易保护升级的背景下,继续推进和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以开放的态度维护就业稳定的重要性。

一、机制分析及文献综述

(一) 进出口影响就业波动的机制分析

从理论上讲,进出口对于就业波动存在两方面影响。对于全球化参与水平不同的企业来说,国际贸易可能通过微观层面的多种渠道影响就业波动。一方面,如果贸易伙伴国内产生经济危机或遭受国际市场变动导致贸易中的风险增加,那么相较于非贸易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会额外遭受国际市场运输成本变动或汇率波动冲击,因而可能面临更高的就业波动性。另一方面,由于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在多个国家生产运营,那么其在面对需求冲击时,相比仅在国内市场生产运营的企业有着更多样化的渠道来熨平波动。

具体地,对于出口企业而言,相对于只在国内销售产品的企业,出口企业拥有更加多元化的销售渠道。当国内经济发生波动或者衰退时,内销企业会因为只有国内单一销售渠道而受到较大冲击,进而加剧就业波动。出口企业因为拥有更加分散的销售市场,可以将国内的产品销售到多个国外市场,分散风险,降低就业波动性。然而与内销企业更易受到国内经济风险的影响不同,外销企业更易受到国外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如果国际市场,特别是出口企业主要销售目的市场产生了波动或衰退,那么外销企业就业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此外,外销企业还会受到诸如汇率波动、政治风险、运输费用波动等额外风险影响,这都会导致企业就业波动的增加(Nguyen and Schaur, 2010)^[1]。

与出口企业类似,进口企业的就业也面临着两方面的影响。对于进口企业而言,相较于只有国内资源投入的企业,一个投入资源来自于多个国家的企业有着更多可相互替代的供应商,能够更容易地承受生产率变化。因此,一个更为多元化的进口企业相比于仅在国内采购的企业将经历较低水平的就业波动(Bergin et al., 2011)^[2]。企业多元化的进口模式会减少其面临的就业波动,因为进口品类的多元化会降低单个进口品种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其他品种的使用,抵消一个特定品种供给不足或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但是,由于生产过程的复杂性,进口和就业波动之间也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与出口的影响类似,由于进口企业国外供应的存在,如果发生国外的经济冲击,那么进口企业将面临更高的就业波动。同时,劳动需求弹性的差异,也导致了受雇于一家进口企业的工人可能产生更高的就业波动(Senses, 2010)^[3]。对于从国外购买中间品从事离岸外包的企业来说,劳动力需求弹性会更高,因为这些企业可以更容易地用进口替代劳动的投入以应对国内的工资增长。因此,在这些企业一个给定的生产率冲击将导致更大的就业波动。

另外,除了全球参与模式和参与强度的影响,一个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频率也关系着就业波动幅度,因为这些企业频繁切换进出口交易状态是较为常见的企业数据特征。例如, Eaton 等(2008)^[4]发现约有一半的哥伦比亚出口商在过去一年没

有出口。对于此类频繁地从国内销售转向出口，或从国内采购转向进口的企业，转移需求来源和生产结构可能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就业波动。重要的是，频繁切换国内外出口目的地或进口来源国，本身可能就是这些企业面对更高的就业波动性的一种内生反应。

（二）进出口对就业影响的经验研究综述

对于进出口贸易与就业活动的关系，在经验研究方面，现有文献更多是在宏观（国家层面或行业层面的进出口贸易）和总量层面（区域或行业的就业总量及就业结构）对二者的内在关联展开了深入讨论。例如，Krugan（1983）^[5]利用国家层面样本，探究了国际贸易政策对于本国就业水平的影响，发现长期来看贸易开放程度能够显著促进就业水平的提升。Greenaway等（1999）^[6]基于英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对进出口贸易与行业就业水平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发现进出口贸易对于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水平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俞会新和薛敬孝（2002）^[7]基于中国工业部门数据的研究得出了与Greenaway等（1999）不同的结论，其研究发现，进口贸易对工业部门就业并不存在显著影响，而出口贸易促进了工业部门就业的增加。唐东波（2011）^[8]利用中国经济普查数据考察了对外贸易对中国技能就业结构的影响，发现进出口贸易均不利于就业结构中高技术劳动力比例的提高。周申等（2012）^[9]考察了1993—2007年工业制成品贸易结构变化所引致的就业效应，发现偏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结构变动对于就业总量存在抑制效应，并导致就业结构偏向熟练劳动。

相比于在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方面的丰富研究，关于就业波动性的研究关注度相对逊色很多。Buch等（2009）^[10]发现除去出口强度变化，德国出口商的销售增长波动性较低。Nguyen和Schaur（2010）运用丹麦的企业数据发现，扩大出口会增加企业产出的边际成本并减少其在国内的销售，因此，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面临的市场波动存在结构性差异，平均而言出口企业面对的国内销售波动要比非出口企业高24%。进口和波动之间的关系同样模糊，Slaughter（2001）运用1958—1991年美国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发现，进口贸易会通过增大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进而增大该企业的就业波动。贸易企业也因交易产品的数量和类型^①以及贸易伙伴的数量和出口产品构成特征^②而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导致了贸易企业多元化经营水平的显著异质性（Johnson，2012）^[11]。Kurz和Senses（2016）^[12]则利用美国制造业部门做了一个综合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相对于无贸易行为的企业，出口型企业的就业波动相对较小，而进口型企业的就业波动相对较大。同时贸易持续时间和强度、贸易数量和种类在解释交易和就业波动之间的强大内在关联中

^①贸易企业选择进口原材料或是中间制成品，而非贸易企业则是通过企业内部生产或从国内市场采购。对于那种需要本企业劳动力参与加工生产的投入品而言，其进口投入品所受的国际市场冲击会直接影响到本企业的就业波动，而对于那些存在替代品的中间投入品，其所受冲击与本企业就业波动的关联度相对小很多。

^②Bernard等（2011）表明企业内的出口产品构成极不平衡，产品选择占出口总差异相当大的比例。

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Caselli等(2015)认为,贸易开放度增加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可能会导致一个较差的多元化生产结构,因此国内经济会面临更高的风险水平,进而就业波动性会随之增加。

国内学者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考察就业波动的周期性演进特征(曹达华,2016)^[13],以及诸如投资冲击(刘宗明,2011)^[14]、融资约束(许志伟等,2011)^[15]等外生因素对于就业波动的影响。从当前研究来看,已有部分学者开展了不同视角下就业波动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侧重关注宏观层面和产业层面的波动性,研究结论也还未达成共识。盛斌和牛蕊(2009)^[16]研究发现,进口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改变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效应对劳动力需求弹性产生提升效应,当加入出口贸易与实际有效汇率因素时则会产生抵消效果,最终贸易开放的净影响降低了就业波动。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的全球生产参与程度具有高度异质性。一部分企业仅从事纯国内生产和销售,只为国内市场服务,并将其资源全部投入国内。而另一部分企业从事国际贸易,进口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出口产品,或两者兼而有之。这样的进出口贸易企业有可能不同于纯粹的国内企业,所雇佣的工人相较纯国内企业雇佣的工人会体验到不同水平的就业波动,因为其面临着更加多样化的市场冲击。

综合来看,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更着重于考察进出口贸易对本国就业总量的影响,而对就业波动性的影响关注较少。对中国就业波动性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视角,在微观层面的考察更是鲜见。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就业“稳定性”问题往往比总量问题更为突出。因此,研究进出口贸易对就业波动性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二、数据、模型及变量

(一) 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数据库:其一是中国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时间段为2000—2013年。该数据库统计了全部国有企业以及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记录。由于该数据库提供了对每一家企业长时间连续的观察,这就为计算企业层面的波动性带来了可能性。我们基于聂辉华等(2012)^[17]以及田巍和余淼杰(2013)^[18]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剔除同一年份企业名称重复的记录;其次,剔除关键性指标缺失的样本。最后,还剔除了明显错误或不符合会计法则的记录,具体包括:一是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实收资本数值为0或为负的样本,二是出口交货值为负的样本;三是企业从业人数小于8的样本;四是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净值超过总资产的企业样本。

其二是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时间段为2000—2013年。该数据库提供了企业每年出口到不同国家8位HS编码的进出口数据,可用以计算企业层面的进出口状态以及进(出)口来源地数量和产品种类。本文参照田巍和余淼杰(2013)的方法,采用“两步法”将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具体

如下：首先，利用企业名称和年份采用未剔除任何企业的原始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进行匹配；然后，用企业所在地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的后七位，将未能根据企业名称合并成功的样本再次合并。

本文分析的样本限定为制造业企业。选择制造业作为分析样本，不仅是因为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所提供的详细数据具有很高的可用性，还考虑到制造业更容易暴露于竞争压力和国际贸易的市场机会中。

根据本文研究目标，还需对样本进行进一步处理。正如本文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的，就业波动的计算需要提供样本企业连续几年的就业数据。为此，首先，本文提取了在整个样本期间至少连续五年报告就业数据的企业样本，并测算了其就业波动性（获得9年跨度的面板数据）。为期5年的时间区间既提供了充分的观察期来计算企业层面的就业波动性，又能够在样本中保留一定程度的企业进入和退出，包括那些存活时间短的企业。本文把就业水平和就业增长率在顶部和底部的1%作为异常值剔除。

（二）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首先构建以下基准计量模型，考察在控制行业和企业特征后，企业贸易状态与其就业波动性之间的内在关联：

$$\ln \sigma_{it} = \alpha_0 + \alpha_1 \exp_{it} + \alpha_2 \text{imp}_{it} + \alpha_3 \text{expimp}_{it} + \varphi X_{it} + \theta Y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ln \sigma_{it} = \beta_0 + \beta_1 \ln \text{expt}_{it} + \beta_2 \ln \text{impt}_{it} + \varphi X_{it} + \theta Y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ln \sigma_{it} = \gamma_0 + \gamma_1 \ln \text{expc}_{it} + \gamma_2 \ln \text{impc}_{it} + \varphi X_{it} + \theta Y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ln \sigma_{it} = g_0 + g_1 \ln \text{expp}_{it} + g_2 \ln \text{impp}_{it} + \varphi X_{it} + \theta Y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i 代表企业， t 代表时间， σ 代表就业波动的度量指数。 exp 表示仅出口企业， imp 表示仅进口企业， expimp 表示混合贸易企业，以上三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企业层面的贸易强度的指标是出口强度（ $\ln \text{expt}$ ）和进口强度（ $\ln \text{impt}$ ）， $\ln \text{expc}$ 表示企业出口国家数量， $\ln \text{impc}$ 表示企业进口国家数量， $\ln \text{expp}$ 表示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量， $\ln \text{impp}$ 表示企业进口产品种类数量，上述变量均取对数。 X 代表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资本密集度、企业负债，以上控制变量亦取对数形式，此外我们还控制了企业的所有制形式， Y 是时间虚拟变量， ε_{it} 为误差项。

（三）变量说明

1. 就业波动性指标

正如本文之前所提到的，对企业层面就业增长率波动的估计需要依据以年度为频率的面板数据。我们参考 Kurz 和 Senses（2016）的方法计算企业的就业波动，与 Kurz 和 Senses（2016）采用固定的5年作为窗口期计算就业波动不同的是，我们采用年度平行移动的方式计算。对于2000—2013年期间，本文只保留了在整个14年期间内至少连续5年持续经营的企业，并在5年窗口期基础上计算就业波动性，由此获得一个包括10年跨度的波动性面板数据，这种测量方法的优点是能在一段时间内获得大多数企业的就业增长率，从而使本文对企业层面就业波动性的研

究更具代表性，并且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固定的企业特性。

为测算就业波动性指标，本文首先需要计算企业 i 在第 t 期的就业增长率 (γ_{ijt})，测算公式如方程 (5) 所示。作为企业层面就业波动性的主要指标，我们由以下等式用企业 i 在时间 t 的就业增长率的对数作为因变量，并估计残差计算出一个有条件的就业增长率：

$$\gamma_{ijt} = \ln(E_{it}) - \ln(E_{i,t-1}) = \delta_{it} + \mu_{jt} + v_{ijt} \quad (5)$$

其中， E_{it} 表示企业 i 在第 t 期的就业量。 γ_{ijt} 则为就业量 E_{it} 取对数后的一阶差分。 δ_{it} 为企业固定效应，可衡量企业内就业波动差异；行业固定效应 μ_{jt} 捕捉特定行业对企业就业波动的冲击； v_{ijt} 为残差项，能够反映就业增长与企业平均值的偏离以及与部门平均值在年份 t 的偏离。为考察动态影响，本文中基于时长为 w 的窗口期，计算了剩余增长率的标准差对就业波动性进行测算。所谓窗口期是指每个企业计算就业波动性的时间区间，例如 5 年窗口期的时间段为：2000—2004，2001—2005，…依此类推，我们称之为“残差法”。具体测算公式如方程 (6)：

$$\sigma w_i = Vol(\gamma_i) = \sqrt{\sum v_{ijt}^2} \quad (6)$$

为了确保测算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计算了就业增长率作为就业的对数差异，并利用这一测度来计算就业增长的标准差，作为企业就业波动性的稳健性检验，本文称之为“标准差法”：

$$\sigma w_i = \left[\frac{1}{w-1} \sum_{\tau=0}^w (\gamma_{i,t+\tau} - \overline{\gamma_i})^2 \right]^{1/2} \quad (7)$$

w 是窗口期的长度， $\overline{\gamma_i}$ 是窗口期 w 内的平均增长率。

2. 进出口相关指标

首先根据企业的贸易状态将企业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其次将企业分为进口企业和非进口企业。再次将企业分为四类：非贸易企业，仅出口型企业，仅进口型企业和混合贸易型企业（既从事出口又从事进口的企业）^①。根据海关数据，在 5 年时间跨度的样本中大约 21.1% 的企业从事出口，14.8% 的企业从事进口，这些企业中的 12.5% 既从事进口又从事出口，8.6% 的企业只从事出口，2.3% 的企业只从事进口。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仅报告出口数据，而未包括进口数据，如单独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就无法测算企业进口状态对其就业波动性的影响。而海关数据则同时报告了企业的出口和进口数据，但其存在的问题是在匹配两套数据库后，如果仅利用海关数据库中的出口贸易额，就会损失一定样本量^②。因此，本文采用了折中的处理

①如果一家企业在其报告就业情况的年份存在出口（进口）行为，则视为出口（进口）企业。既未进口又未出口，归类为“非贸易企业”。如果一家企业从事进口（出口）贸易而没有参与过出口（进口）贸易则被定义为“仅进口（出口）型企业”。如果一家企业既从事出口又从事进口贸易，则被定义为“混合型企业”。

②因为只能根据企业名称进行不完全匹配。

方式：凡是涉及到出口贸易的指标测算，均是以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计算为基准指标，以海关数据作为稳健性检验。由此既可以保证进出口贸易数据均能得以测算，也能够更充分利用已有数据信息。

除却贸易状态之外，贸易强度的变化对企业就业波动性的影响也值得进行探讨。本文对贸易强度的考察选取了进口规模、出口规模、进口比例和出口比例作为测算指标。其中进（出）口规模以企业的年进（出）口金额来测算，进（出）口比例是以企业进（出）口金额与企业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测算而得。此外本文还计算了每个年度企业贸易伙伴国的数量，并且在产品层面（HS8分位）计算了企业进出口产品种类数量。本文对进口最终品和中间品的区分采用了BEC产品分类编码^①。

3. 其他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集合中，本文参考Gan等（2016）^[19]纳入了以下因素：企业规模（*size*），以企业的就业总人数来测算；资本密集度（*kl*），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除以企业年末就业人数衡量；企业成立年限（*age*），用当年与企业注册成立年的差值表示；负债率（*debt*），用企业负债除以企业资产衡量。为控制企业所有制的影响，本文设置了五个所有制类型的虚拟变量，所有制类型及其代码分别为国有企业（*soes*），集体企业（*coes*），私营企业（*private*），港澳台企业（*hntie*），外资企业（*fies*）。另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②

三、贸易影响就业波动性的计量结果分析

（一）企业贸易状态对就业波动性的影响

表1报告了企业进出口状态影响就业波动性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就业波动性指标是根据“残差法”计算而得。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列（1）引入了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而得的企业出口状态，结果显示相比于非贸易企业，出口贸易企业有着更小的就业波动，列（2）将该指标替换为海关数据的测算值，所得的计量结果依然稳健。列（3）为企业从事进口贸易对其就业波动性的影响，该指标依托于海关数据计算而得，再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后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企业相比于非贸易企业亦有着较低就业波动性，列（4）引入了企业贸易状态为混合贸易企业、仅进口型企业、仅出口型企业这三个核心变量（其中出口数据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结果发现这三类企业相比于非贸易企业均有着更低的就业波动性。即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不管是参与进口还是参与出口，均能够明显地降低企业就业的波动性。如果企业既参与出口，又参与进口，对就业波动性的降低程度更大。这表明，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参与国际贸易的确能够稳定企业的

^①将BEC编码和HS编码对应后进行区分。

^②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论文的描述性统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生产规模和对劳动力的雇佣。全球化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分散风险,平滑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从而起到了稳定企业就业的作用,降低了企业的总体就业波动率。列(5)将该指标替换为海关数据的测算值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是类似的。

表1 企业贸易状态影响就业波动性的回归结果(波动性计算方式一)

变量	(1)	(2)	(3)	(4)	(5)
	出口(工企)	出口(海关)	进口(海关)	出口(工企)	出口(海关)
出口	-0.0049*** (0.0013)	-0.0121*** (0.0017)			
进口			-0.0080*** (0.0015)		
混合贸易				-0.0130*** (0.0021)	-0.0154*** (0.0021)
只出口				-0.0033** (0.0014)	-0.0108*** (0.0018)
只进口				-0.0043* (0.0022)	-0.0053* (0.0028)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0.2674*** (0.0104)	0.2687*** (0.0104)	0.0960*** (0.0088)	0.0966*** (0.0088)	0.0975*** (0.0088)
观测值	1 126 162	1 126 162	1 126 162	1 126 162	1 126 162
R平方	0.1350	0.1351	0.1350	0.1351	0.1351

注:括号中数值为对应变量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性水平。所有表格已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为节约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下表同。

考虑到进出口贸易会影响企业的就业稳定,企业的就业稳定也能影响出口贸易,这就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为了控制这种内生性,本文采取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引入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一阶项。^①结果显示混合贸易企业、仅进口型企业及仅出口型企业这三个核心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第二种方式就是将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引入方程,并采取动态面板GMM的方法解决内生性,本文分别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进行分析。结果同样显示混合贸易企业、仅进口型企业和仅出口型企业这三类企业相比于非贸易企业,有着更低的就业波动性。控制内生性之后的结果表明,论文的结果受到内生性影响比较小,是较为稳健的。

^①采用滞后项的原因在于,一般来说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一阶项会影响被解释变量。但是反过来,被解释变量不能影响未发生的事情,因此被解释变量不可能影响前一期解释变量,这样在逻辑上就解决了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

表2 滞后与动态面板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滞后一期	滞后一期	差分 GMM	差分 GMM	系统 GMM	系统 GMM
	工企	海关	工企	海关	工企	海关
就业波动 (-1)			0.8066*** (0.0038)	0.8066*** (0.0038)	0.9326*** (0.0026)	0.9333*** (0.0026)
混合贸易	-0.0158*** (0.0020)	-0.0156*** (0.0020)	-0.0095*** (0.0015)	-0.0072*** (0.0015)	-0.0167*** (0.0016)	-0.0148*** (0.0016)
只出口	-0.0059*** (0.0013)	-0.0112*** (0.0018)	-0.0029** (0.0012)	-0.0037*** (0.0013)	-0.0073*** (0.0012)	-0.0095*** (0.0014)
只进口	-0.0045** (0.0022)	-0.0063** (0.0029)	0.0011 (0.0016)	-0.0030 (0.0020)	-0.0021 (0.0018)	-0.0053** (0.0022)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0.3975*** (0.0087)	0.3979*** (0.0087)	0.0308*** (0.0067)	0.0309*** (0.0067)	0.0575*** (0.0069)	0.0575*** (0.0069)
观测值	1 076 298	1 076 298	885 866	885 866	885 866	885 866
R ²	0.1448	0.1448				

为确保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标准差法”的方法计算了就业波动性的替代指标，这一稳健性检验结果具体如表3所示，该表中列(1)—列(6)中的企业贸易状态测算均与表1中一致。结果显示，表3中企业贸易状态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与表1—表2中基本一致，这表明计量结果基本稳健可靠。

表3 企业贸易状态影响就业波动性的回归结果 (波动性计算方式二)

变量	(1)	(2)	(3)	(4)	(5)	(6)
	出口 (工企)	出口 (海关)	进口 (海关)	出口 (工企)	出口 (工企) -滞后	出口 (海关)
出口	-0.0010** (0.0004)	-0.0018*** (0.0005)				
进口			-0.0016*** (0.0005)			
混合贸易				-0.0028*** (0.0006)	-0.0050*** (0.0006)	-0.0026*** (0.0006)
仅出口				-0.0004 (0.0004)	-0.0016*** (0.0004)	-0.0014*** (0.0005)
仅进口				-0.0002 (0.0007)	-0.0014** (0.0007)	-0.0007 (0.0008)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0.0929*** (0.0032)	0.0929*** (0.0032)	0.0928*** (0.0032)	0.0928*** (0.0032)	0.1994*** (0.0028)	0.0928*** (0.0032)
观测值	1 374 236	1 374 236	1 374 236	1 374 236	1 205 555	1 374 236
R ²	0.2056	0.2056	0.2056	0.2056	0.1924	0.2056

(二) 企业进出口强度对就业波动性的影响

1. 企业进出口规模对就业波动性的影响

表4报告了企业进出口规模对其就业波动性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其中列(1)—列(3)中涉及到的出口贸易数据均是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而得。列(1)中的就业波动性根据“残差法”测算，结果显示，企业的出口规模和进口规

模均与其就业波动性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在列（2）中将就业波动性替换为其滞后一期值，以及列（3）中将其替换为“标准差法”测算之后，计量结果均显示，企业的出口和进口规模越大，其就业波动性越低。列（4）—列（6）中涉及到的出口贸易数据则是根据海关数据库的数据信息测算，就业波动性指标测算则与列（1）—列（3）一致，结果依然稳健可靠。

表4 企业进出口规模影响就业波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工企			海关		
	波动一	波动一（滞后）	波动二	波动一	波动一（滞后）	波动二
出口规模	-0.0010*** (0.0002)	-0.0013*** (0.0001)	-0.0003*** (0.0000)	-0.0011*** (0.0001)	-0.0011*** (0.0001)	-0.0002*** (0.0000)
进口规模	-0.0009*** (0.0001)	-0.0008*** (0.0001)	-0.0002*** (0.0000)	-0.0004*** (0.0002)	-0.0004** (0.0002)	-0.0001** (0.0000)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0.2677*** (0.0104)	0.3974*** (0.0087)	0.0927*** (0.0032)	0.2692*** (0.0104)	0.3980*** (0.0087)	0.0928*** (0.0032)
观测值	1 126 160	1 076 295	1 374 232	1 126 160	1 076 295	1 374 232
R ²	0.1352	0.1449	0.2057	0.1353	0.1449	0.2057

2. 企业进出口比例对就业波动性的影响

企业进出口比例亦是企业贸易强度的重要测算指标，表5报告了企业进出口比例对其就业波动性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与表4一致，其中列（1）—列（3）中涉及到的出口贸易数据均是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而得，列（4）—列（6）中涉及到的出口贸易数据则是根据海关数据库的数据信息测算。其中的就业波动性指标测算亦与表4中相对应的各列一致。计量结果显示，企业出口比例和进口比例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企业的出口比例和进口比例的提升对于其就业波动性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

表5 企业进出口比例影响就业波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工企			海关		
	波动一	波动一（滞后）	波动二	波动一	波动一（滞后）	波动二
出口比例	-0.0071** (0.0030)	-0.0186*** (0.0028)	-0.0032*** (0.0009)	-0.0038*** (0.0006)	-0.0039*** (0.0006)	-0.0008*** (0.0002)
进口比例	-0.0030*** (0.0008)	-0.0012* (0.0007)	-0.0004* (0.0002)	-0.0011 (0.0008)	0.0006 (0.0008)	0.0000 (0.0002)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0.2641*** (0.0103)	0.3948*** (0.0087)	0.0923*** (0.0032)	0.2669*** (0.0104)	0.3960*** (0.0087)	0.0925*** (0.0032)
观测值	1 124 394	1 075 122	1 372 174	1 124 394	1 075 122	1 372 174
R ²	0.1355	0.1451	0.2062	0.1356	0.1451	0.2063

四、贸易企业就业波动性的来源及进一步分析

(一) 永久的和临时的贸易商

参与贸易的企业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企业持续地参与贸易,有的企业只是在某些年份参与贸易。这些临时参与贸易的企业频繁的进入和退出市场可能会对其就业产生更大影响。我们进一步探讨就业波动性和贸易持续时间之间的关系,将窗口期间每年仅从事出口的企业定义为“永久只出口企业”,每年仅从事进口的企业定义为“永久只进口企业”,每年既从事出口又从事进口的企业定义为“永久混合型贸易企业”。如果一个企业至少出口过一次但并不是每年均出口,并且从不进口,就定义其为“临时只出口企业”。“临时只进口企业”和“临时混合型企业”也用类似方式定义。表6的结果显示,与非贸易商相比,“永久只出口”,“永久只进口”和“永久混合型贸易”企业的就业波动性均较小。而“临时只出口企业”,“临时只进口企业”和“临时混合型企业”则可能存在较高的就业波动性,特别是我们采用第二种方式计算就业波动性时。这证实了进口和就业波动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多是由临时进口商驱动的。这些研究结果也强调了企业贸易的持续时间对企业就业波动的重要影响。

表6 永久和临时贸易商影响就业波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波动一	波动一	波动二
	出口(工企)	出口(海关)	出口(工企)
永久混合贸易	-0.0572*** (0.0037)	-0.0431*** (0.0033)	-0.0209*** (0.0011)
永久只出口	-0.0309*** (0.0026)	-0.0321*** (0.0027)	-0.0135*** (0.0007)
永久只进口	-0.0237*** (0.0038)	-0.0170*** (0.0044)	-0.0090*** (0.0012)
临时混合贸易	0.0023 (0.0031)	0.0017 (0.0025)	0.0048*** (0.0010)
临时只出口	0.0049*** (0.0014)	-0.0015 (0.0018)	0.0054*** (0.0004)
临时只进口	-0.0001 (0.0016)	-0.0013 (0.0019)	0.0024*** (0.0005)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常数项	0.2726*** (0.0104)	0.2749*** (0.0104)	0.0964*** (0.0032)
观测值	1 126 160	1 126 160	1 374 232
R ²	0.1361	0.1359	0.2076

(二) 国家和产品数量

正如本文在前文中所探讨的,贸易企业就业波动性可能来自于外部的冲击。由于企业在交易产品的种类和贸易伙伴的数量方面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异质性,贸易企

业能够在不同国家和产品之间分散风险。因此企业出口国家的数量和产品种类的差异,也会对企业就业波动产生影响。本文将出口国家、进口国家数量,出口产品、进口产品种类引入方程,结果发现,企业出口国家数量越多,出口产品种类越多,企业就业波动性越低。进口国家数量对企业就业波动也存在负向影响,但是显著性不高,进口产品种类对企业就业波动的影响则不显著。更高数量的出口目的国以及更高数量的出口种类与更低水平的就业波动性相关,这可能是特定国家或者产品的冲击,可以通过风险分散化得以化解的原因。进口与企业的中间投入密切联系,这会对企业就业产生两方面影响:进口种类越多,也更可能从更多的国家进口,在中间品不存在替代性的情况下,一旦某些中间品供应产生短缺会影响企业生产的整个流程,导致就业的波动;如果多个国家能提供中间品的供给,特别是中间品存在一定替代性的情况下,也能够分散风险。

表7 国家和产品数量影响就业波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3)	(2)	(4)
	波动一	波动二	波动一	波动二
出口国家数量	-0.0071*** (0.0010)	-0.0015*** (0.0003)		
进口国家数量	-0.0035** (0.0014)	-0.0007 (0.0004)		
出口产品种类			-0.0076*** (0.0011)	-0.0018*** (0.0003)
进口产品种类			-0.0026** (0.0010)	-0.0002 (0.0003)
常数项	0.2684*** (0.0104)	0.0927*** (0.0032)	0.2685*** (0.0104)	0.0928*** (0.0032)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0.2684*** (0.0104)	0.0927*** (0.0032)	0.2685*** (0.0104)	0.0928*** (0.0032)
观测值	1 126 160	1 374 232	1 126 160	1 374 232
R ²	0.1353	0.2057	0.1353	0.2057

(三) 分解进口类别

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更高份额的进口投入与更高水平的企业层面的就业波动性相关。由于企业进口中既可能存在最终品也可能存在中间品。中间品进口表明,企业的中间投入将由进口提供而非自身生产,因此产生对就业的替代。企业进口中间品将其投入生产,外部商品价格的外生波动和外部供给冲击将通过进口中间品传输。如果存在外部冲击,将直接影响企业的产出及就业。为了分析通过特定渠道进口对企业层面就业波动性的影响,本文将每一企业的进口份额按照 BEC 分类编码分解成进口中间品和进口最终品。结果显示,进口中间品对企业的就业波动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进口最终品也存在负向影响,但是要么显著性不强,要么不显著,同时系数也较小。表明进口和波动性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中间品的进口决定。进口最

终品的企业主要的目的是用进口替代国内的生产，这有可能会增加就业的波动。而进口中间品的企业主要目的是为了提提高国内生产。通过进口带来的多元化的供应体系，降低了某些供应渠道或单个进口品种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帮助企业抵御供给不足或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

表 8 对进口种类的再分解

变量	(1)	(2)
	波动一	波动二
进口中间品	-0.0076 *** (0.0017)	-0.0017 *** (0.0005)
进口最终品	-0.0031 * (0.0016)	-0.0002 (0.0005)
控制变量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常数项	0.2669 *** (0.0104)	0.0927 *** (0.0032)
R ²	0.1351	0.2056

(四) 贸易伙伴国特征差异

接下来，本文检验企业层面就业波动性和贸易强度与企业的贸易伙伴特征是否有关。如果对于特定的一组国家，需求或生产力冲击的幅度或频率更大，那么与这些国家进行贸易的企业和与有相对稳定经济环境的国家从事贸易的企业相比，二者的影响是有差别的。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在企业贸易伙伴的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分解进出口份额，贸易伙伴发展水平被记录为与这些国家的波动水平有关。

表 9 给出了将企业层面的就业波动性联系到进出口贸易伙伴的发展水平的研究结果。在本部分中，本文用来自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①的进出口份额来替代等式 (1) 中非原材料的进出口份额。表格包括了企业特征、产业特征、原材料份额等控制变量。和前文一样，分析针对的是贸易企业。

下表给出了区分不同发展水平贸易伙伴样本的计量结果，具体地，本文将贸易伙伴国按照收入水平区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结果发现，向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出口份额对本企业的就业波动性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出口到低收入和进口自低收入国家则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就业波动。

(五) 企业所有制特征的差异

进出口对企业就业波动的影响可能会因为企业所有制特征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担负着更多社会责任，其雇佣决策不但受到市场的影响，同样也会考虑到社会稳定因素，其就业相对稳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决策则主要考虑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外资企业由于与国外市场具有天然联系，其受到进出口

^①这些国家根据世界银行以人均收入为基础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对于每一类国家的全部名单，请参阅：<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

的影响更为强烈。本文将企业所有制类型分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类。结果发现企业的进出口对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于私营企业，与既不进口又不出口的企业相比，混合贸易企业和只出口企业的就业波动较低。对于外资企业，与非贸易企业相比，混合贸易企业、只出口企业和只进口企业的就业波动均较低。结果与预期相符。

表9 不同贸易伙伴国特征差异

变量	(1)	(2)
	就业波动一	就业波动二
出口到高收入国家	-0.0047** (0.0018)	-0.0013** (0.0006)
出口到中等收入国家	-0.0054*** (0.0016)	-0.0018*** (0.0005)
出口到低收入国家	0.0113*** (0.0021)	0.0032*** (0.0007)
进口自高收入国家	-0.0060*** (0.0015)	-0.0018*** (0.0005)
进口自中等收入国家	-0.0088*** (0.0018)	-0.0038*** (0.0006)
进口自低收入国家	0.0111*** (0.0028)	0.0029*** (0.0009)
控制变量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常数项	0.2713*** (0.0106)	0.0960*** (0.0033)
观测值	1 126 160	1 374 232
R ²	0.1352	0.2057

表10 区分企业所有制特征

变量	(1)	(2)	(3)
	国有集体	私营	外资
混合贸易	-0.0083 (0.0059)	-0.0124*** (0.0032)	-0.0170*** (0.0032)
仅出口	-0.0037 (0.0035)	-0.0040** (0.0019)	-0.0073*** (0.0028)
仅进口	-0.0018 (0.0061)	-0.0023 (0.0035)	-0.0096*** (0.0032)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企业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时间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常数项	0.5565*** (0.0262)	0.0836*** (0.0122)	0.5007*** (0.0225)
观测值	254 867	591 752	279 438
R ²	0.1170	0.1741	0.0947

五、结 论

稳就业是民生所系，亦是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保障。本文采用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对进出口贸易与企业就业波动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不管是参与进口还是参与出口，均能够降低企业就业的波动性。如果企业既参与出口又参与进口，对就业波动性的降低程度更大。这表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分散风险，平滑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从而起到了稳定企业就业的作用，降低了企业的总体就业波动率。

企业参与贸易的时间、贸易品种类以及贸易伙伴的数量和特征，在解释就业波动性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是对进口还是出口，一家企业参与贸易的时间越长，其就业波动性越低。那些只是临时参与贸易的企业，其就业波动性反而会提高。也就是说企业最终品销售以及中间品进口，如果在国内外的目的地和来源地之间频繁切换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就业波动性，其本身可能是对频繁需求的变化和生产力冲击的内生反应。与多元化假设相一致，更高数量的出口目的国以及更高数量的出口种类与更低水平的就业波动性相关，这表明特定国家或者产品的冲击，可能通过风险的分散化得以化解。进口与企业的中间投入密切联系，进口国家数量的增加，能够降低企业就业波动，但是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则对企业就业波动无显著影响。对进口的分解表明，进口强度和就业波动性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中间品进口决定的，而非制成品的进口。企业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进行贸易对其就业波动性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当企业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贸易时，其就业波动性较低，而与低收入国家进行贸易时，其就业波动性较高。当区分企业所有制特征时，我们发现进出口对企业就业波动的负向影响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比较明显。

本文的研究对“进出口能否稳就业”给出了确定的答案，这不仅是对关于进出口贸易与就业波动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对我国如何协调贸易政策和就业政策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我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战略，以更好地把握参与国际贸易对稳定就业的重要机遇期，为本国的就业提供稳定的环境。

其一，鉴于进出口贸易不仅对解决部分就业有着一定促进效应，亦是维持就业稳定性重要途径，我国应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放之路，继续推进和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积极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为贸易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稳定的就业环境。其二，要建立稳定友好的贸易伙伴关系，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为重点，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着力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网络，减少贸易壁垒对于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阻碍，从而促使进出口能够发挥稳就业的最大效能。第三，对企业来说，要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建立持久的中间品供应商和销售伙伴，同时努力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登。更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打造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将全球性资源纳入自身生产体系，提升企业竞争力，并稳定生产与就业。

[参考文献]

- [1] NGUYEN D X, SCHAUR G. Cost linkages transmit volatility across markets [R]. EPRU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0.
- [2] BERGIN P R, FEENSTRA R C, HANSON G H. Volatility due to offshoring: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5 (2): 163-173.
- [3] SENSES M Z. The effects of offshoring on the elasticity of labor demand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81 (1): 89-98.
- [4] EATON B, ESLAVA M, KUGLER M, TYBOUT J. The margins of entry into export markets: evidence from Colombia. In: Helpman, Elhanan, Marin, Dalia, Verdier, Thiery (Eds.), *The Organization of Firms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p. 2008.
- [5] KRUGMAN P R. Targeted industrial policies: theory and evidence [J]. *Industrial change and public policy*, 1983; 123-155.
- [6] GREENAWAY D, HINE R C, WRIGHT P.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rade on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5 (3): 485-500.
- [7] 俞会新, 薛敬孝. 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工业就业的影响 [J]. *世界经济*, 2002 (10): 10-13.
- [8] 唐东波. 全球化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 [J]. *世界经济*, 2011 (9): 95-117.
- [9] 周申, 李可爱, 鞠然. 贸易结构与就业结构: 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 29 (3): 63-75.
- [10] BUCH C M, DOPKE J, STROTMANN H. Does Export Openness Increase Firm - level Output Volatility? [J]. *The World Economy*, 2009, 32 (4): 531-551.
- [11] JOHNSON R C. Trade in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4, 6 (4): 39-83.
- [12] KURZ C, SENSES Z M. Importing, exporting, and firm-level employment volatilit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98: 160-175.
- [13] 曹达华. 澳门经济周期与就业波动的关联效应分析 [J]. *学术研究*, 2016 (08): 107-112
- [14] 刘宗明. 投资冲击与劳动就业动态: 经验事实与理论解释 [J]. *南开经济研究*, 2011 (06): 66-93.
- [15] 许志伟, 薛鹤翔, 罗大庆. 融资约束与中国经济波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内的动态分析 [J]. *经济学(季刊)*, 2011, 10 (01): 83-110.
- [16] 盛斌, 牛蕊. 贸易、劳动力需求弹性与就业风险: 中国工业的经验研究 [J]. *世界经济*, 2009 (06): 3-15.
- [17] 聂辉华, 江艇, 杨汝岱.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 [J]. *世界经济*, 2012, 5: 142-158.
- [18] 田巍, 余淼杰. 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3 (1): 28-44.
- [19] GAN L, Hernandez M A, Ma S. The higher cost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Minimum wages and firms export behavior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0: 81-94.

(责任编辑 于友伟)

Import, Export and Employment Volatil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LI Lei SHENG Bin WANG Xiaojie

Abstract: Employment stability i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paper used micro-enterprise data to study the internal correla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nd enterprise employment volatility. This study finds that compared with non-trading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engaged in import and export have lower employment volatility. The higher the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and intensity of the enterprises are, the lower their employment volatility will be. At the same time, those permanent traders have lower employment volatility, while those who are only temporarily involved in trade have higher employment volatility. Further studies reveal that a higher number of export destination countries and export categories are related to a lower level of employment volatility.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importing countries can reduce the employment volatilities of enterprises, while the increase in the types of imported products has non-significant effect. The decomposition of imports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ort intensity and employment volatility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non-raw materials and non-processed products.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s on enterprise employment volatility when trading with partners from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Namely there will be a lower employment volatility when trading with high-income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By distinguish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ownership,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mports and exports on the employment volatilities of enterprises is more pronounced for private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whi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table employment in the new normal economy.

Keywords: Import; Export; Employment; Volatility